

宏观考察倭寇的有益尝试

——《倭寇—海上历史》评介

罗 通 秀

14~16世纪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经济的孕育下萌芽。由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以商品生产为普遍的统治形式，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绝对规律，以资本、雇佣劳动和市场为发展条件，因而它一出现就与旧的封建经济发生了矛盾，强烈要求突破旧的封建主义的狭小范围，极力向外扩张掠夺，谋求单靠本国所无法满足的发展条件：资本、劳动、市场。一时间，航海探险、开辟航道、发现美洲、占地殖民、买卖奴隶、走私贸易、海盗劫掠等等现象充斥于14~16世纪的世界历史。曾一度横行于东亚海域，给东亚各国(特别是朝鲜和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灾祸的倭寇就出现于14~16世纪这个变革的动荡时期。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也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问题。只有把这一问题列于对14~16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研究中才能获得对倭寇的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的《倭寇——海上历史》(以下简称《倭寇》)一书，就是从国际的观点(海上历史)研究倭寇问题的一部尝试性论著。

这部书不是简单地把倭寇描写成烧杀抢掠的日本海盗集团，也摒弃了“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的这种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倭寇观。作者的意图是，“与其论述倭寇的功罪，莫如从尽可能高的观点来考察倭寇的活动，在东亚国际社会的背景中立体地刻画倭寇的本来面目。”(《倭寇》中译本第3页)，出于此种目的，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关于倭寇的分期问题，作者认为：作为特定意义的“倭寇”，兴起的时间是1350年，即《高丽史》、

《高丽史节要》等朝鲜史料在记述1350年倭寇固城、竹林、巨济等地方时所说的“倭寇之侵，始于此”，或“倭寇之兴，始于此”。结束的时间是在16世纪后期明朝解除海禁令之时。因此，作者认为倭寇是指14~15世纪的倭寇与16世纪的倭寇，对倭寇的研究自然应以这两个时期的倭寇为对象。由于这两个时期倭寇发生的原因、构成人员、活动地区、性质都完全不同，二者且无必然的联系，作者认为传统的“前期倭寇”、“后期倭寇”的称呼并不恰当，因而采用了“14~15世纪的倭寇”和“16世纪的倭寇”的称呼。

关于14~15世纪的倭寇产生的东亚国际环境，作者着重分析了蒙古的兴起与高丽王朝的衰落，认为在13世纪中叶前，高丽与日本虽无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经济的发展使两国民间贸易日趋频繁，靠近高丽的对马岛居民已发展到以贸易为主。13世纪中叶，从事贸易的日本船被称为进奉船。这时蒙古兴起并举兵东侵，高丽在与蒙古的对抗中，国力衰落，由最初对进奉船的限制发展为拒绝接纳日本到高丽的进奉船。这对于以贸易为生的沿海居民来说，不能进行贸易就随时有转变为海盗的可能性。此外，衰落中的高丽土地制度紊乱、军备松弛，公民纷纷逃散流亡，而被称为禾尺、才人之类的“贱民”，命运更为悲惨，他们随时有假冒倭寇进行活动的可能。可能终于在1350年变成了事实。此时高丽在遭受蒙古人及元朝长达百年的侵袭、劫掠之后，陷入空前疲弊状态，倭寇便乘机而起。此后直到高丽王朝倒台的1392年，倭寇猛烈骚扰朝鲜半岛持续约40年。1392年，李成桂建朝鲜王朝后，实行了田制改革，充实了军备，展开外交交涉，与对马建立交通关系，加强了国力。同时对倭寇实行了怀柔政策，

诱劝倭寇降服，让归顺的倭寇安居乐业，使一部分倭寇成了所谓投化倭人；许可倭寇到朝鲜进行贸易，使另一部分倭寇成为使送倭人与兴利倭人。终于使倭寇发生了变质与分解，并迅速衰落。残余倭寇又在1419年遭到沉重打击，从此大体停止了活动。

作者认为14~15世纪的倭寇活动的范围主要是朝鲜半岛，中国的山东沿海和其他地区尽管受到倭寇袭扰，但远不如朝鲜半岛严重。14~15世纪的倭寇是以掠夺粮食与人口为主，其成员有很多日本人，“他们在朝鲜半岛的活动作为日本人罪恶史的一页必须永远记住。”（第5页）但其中也有不少叫做斥尺、才人的朝鲜贱民阶层。

关于16世纪的倭寇，作者认为它们完全不同于14~15世纪的倭寇，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社会生产的发展与海禁政策的僵持”。（第5页）其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第4页），其目的是“强行走私贸易”，“暴行虽是倭寇的一个方面，但决不它是它的全部形象”。（第5页）我们认为这些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是有史实根据的。

就中国国内社会生产的发展而言，商品经济在16世纪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丝绵绸缎与瓷器是行销于国内外的主要产品。此外还有蔗糖、纸张、铁器、水果等，特别是东南沿海省份工商业尤为发达。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海外贸易的相应发展，民间海上往来日趋频繁。据记载，明代中国经商到吕宋的有数万人，到日本的也有2、3万人。当时中国的造船业也处在国际领先地位。总之，16世纪的中国既有进行海外贸易的要求，也有从事海外贸易的能力，只要政府实行“措置合宜”的开放政策，必将促使已经萌芽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然而，明朝统治者看不到这种历史发展潮流，看不到世界大变革的前奏，死守“重农抑商”的信条，奉行自古以来以朝贡与对朝贡的颂赐（回赐）为原则的中外交往思想。一方面由官方垄断统治阶级的需要品与军备资材的收买，另一方面则禁止民间或私人与外国人接触。明王朝建国之初就颁布了海禁令，最初禁止“下海通蕃”，即禁止与外国人做生意，进而提出“寸板不许下海”，连中国人彼此之间的贸易也被禁止了。海禁不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给沿海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困难。沿海许多居民（有的地方占居民人口的十分之九）是靠海为生，即靠渔业和中转运输为生的，海禁无疑断绝了他们的生路。正如《倭寇》一书所指出的：“在商

品流通经济已经相当发展的阶段，强行实行这种政策自始就是没有道理的。”（第58页）

许多商人和沿海居民忽视海禁，铤而走险，开船出海，从事运输和走私贸易。为了对付官府的清剿，走私贸易者不得不结成团伙，置备武器，甚至建立据点。这时渡海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在要求与明朝进行贸易遭到拒绝后，便与中国走私贸易者串通，在沿海从事走私贸易。与此同时，明朝加紧了对日本遣明船（1401—1547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贸易船，共19次，每次船若干艘，每艘一次可获利润1万贯以上）的限制，到1547年遣明船制度宣告结束，遣明船作为获得中国物资的唯一手段已不复存在，于是日本人也只好参加东南沿海地方的走私贸易。显然，是海禁政策把中国、日本、葡萄牙等国的许多商人逼上了走私贸易的道路。当明朝政府严厉清剿时，又把走私贸易者逼上了倭寇的道路。直到明嘉靖年间发展成严重的倭患。当时，著名倭寇首领王直居然拥众10万余，纵横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明朝官兵奈何不得。后来只因明朝统治者采取分化、招安、欺骗等手法拘捕了王直并于1559年处死，才使倭寇大伤元气。别的“倭寇”海上武装集团，也在明朝军队清剿下被消灭。1567年，明朝解除了海禁令，这是因为舆论指出倭寇猖獗的主要原因与海禁有关。不久，明朝有限制地许可商船到南洋各地进行贸易，勉强开洋，而不是完全开放。尽管如此，开洋还是有助于贸易的发展的，残余的倭寇活动也在这种形势下逐渐走向结束。

由此可见，16世纪的倭寇是对明王朝海禁政策的反动。海禁政策逼商为寇、逼民为寇，置我国东南沿海各地于倭寇的凶威之下，使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海禁带来的恶果与严重教训必须作如是观。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倭寇》一书的作者田中健夫是研究中世纪日本对外关系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学家，对倭寇史有专深的造诣。在这部书里，作者仅用了8万字的有限篇幅，扼要地清晰地描述了延续3个世纪之久而又极为复杂的倭寇活动全过程。书中提到的许多史料对我国史学工作者也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书后的附参考文献目录，对于研究倭寇问题的学者也提供了不少方便。我相信本书引会引起我国学者的兴趣，推动对倭寇问题的探讨。本书作者在中文版前言中希望“14~16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史能作为日中两国学者的共同研究课题深入下去”，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